

新时代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陈雷刚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总结用好我国开放发展的成功经验,加强对开放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谋划”。新时代以来,广东充分把握多重高水平开放平台的叠加效应,勇做制度型开放“探路人”,建强国内国际双循环“链接地”,开创了省域对外开放新局面。梳理总结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实践及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A. 实践探索

新时代以来,广东大力谋划“主动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双向开放”,有力布局高能级开放平台,推动省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主动开放”成效显著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广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重要指示。从2017年4月要求广东为全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到2018年10月寄望广东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再到2023年4月赋予广东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的时代使命,这些殷殷嘱托凸显了广东在示范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独特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亲自谋划部署了广东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和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等重大战略,赋予广东探索高水平开放的系列重要平台载体。除此之外,广东还被赋予服务业扩大开放、跨境电商、营商环境创新等改革试点,为全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探路。在中央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引领下,广东不断丰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支持体系,印发广东省委、省政

府《关于实施“五外联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不断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多重国家战略的叠加优势、先行先试的改革优势以及丰富的政策支持体系等助推广东在“主动开放”方面成效显著。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12年的6.21万亿元增加到2024年的9.11万亿元,总量连续39年位居全国首位。

坚持改革创新 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新时代以来,广东以自贸试验区建设全力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规则对接和规制衔接,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着力促进贸易与投资更加便利,让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作用更加凸显。以自贸区建设为载体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广东通过为自贸区发展立法、在13个地市设立广东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等措施,全面提升自贸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水平。自2015年以来,聚焦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粤港澳合作等领域,实现“从0到1”的制度创新、“从1到N”的辐射带动。截至2024年底,广东自贸区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772项,在全国复制推广43项,占全国集中推广的四分之一。以服务贸易为焦点探索构建高标准规则体系。比如,对标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在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竞争中性等方面先行先试;抓好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经开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等重大改革试点;推动粤港澳服务业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出台措施便利港澳法律、会计、保险、航运等专业服务人士和机构在广东执业。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打造制度环境新样板。为高水平打造引资“强磁场”,广东先后出台“外资十条”及其修

订版、“稳外资十二条”“招商引资二十条”等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全国首部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地方性法规,落实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力塑造营商环境新优势。

坚持互惠互利 在“双向开放”中实现共赢

新时代以来,广东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一方面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引导外资不断流向先进制造业、现代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不断加快企业“走出去”步伐,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着力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培育引资新优势。近年来,广东竭力办好“投资中国年”广东专场、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经贸合作招商会、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招商大会等一系列重磅招商活动。总投资百亿欧元的湛江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总投资百亿美元的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等重量级外资项目纷至沓来。广东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和新兴投资领域的重要目的地。着力推动高水平“走出去”,实现双向投资提质增效。近年来,广东积极组织经贸团组出访,对外投资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中,2024年1-12月,广东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210.7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42亿美元,均居全国地方省市首位;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服务对外投资企业的重要平台,截至2024年,广东共设立8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发展,广东推动自身由引资大省转变为双向投资大省。

锻造开放平台 深入拓展“全面开放”

高能级开放平台既是资源要素集聚高地,又是制度创新高地。广东加快打

造新时代高能级开放平台,把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等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先行先试作用和枢纽功能,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率先出台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扶持政策等,设立广东丝路基金,扩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资渠道;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经过多年的培育壮大,逐步发展为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展会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4000列,传递出大湾区外贸经济发展的强劲脉动。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建设。大湾区和四大合作平台是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场。广东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深入实施“湾区通”工程,“湾区认证”“湾事通”等有效助力大湾区市场一体化。

抓好国家改革试点示范。深圳前海、广州黄埔、广州南沙入选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广州、深圳、佛山进入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名单;广州、深圳获批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这些改革试点或示范成为广东创新服务模式、扩大贸易的有力支撑。

B. 经验启示

梳理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纵观其从多向拓展、不断深化到提能升级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经验启示。

坚持国家战略引领 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

进入新时代,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

整期,我国对外开放面临诸多不利因素,需要广东在对外开放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党中央坚定地把广东放在国家发展战略宏伟格局中规划,推动多重国家战略在广东密集实施,为高水平开放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广东以国家重大战略为载体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塑造产业国际竞争新优势,不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新成果。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积极实施国家战略,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推动工作,以高能级开放平台释放制度创新红利、拓展市场空间,省域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不断取得突破。

推动实现规则相联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特征之一。新时代以来,广东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设立自贸试验区,实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广东自贸试验区先后发布九次改革创新经验清单,涉及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等,对于解决对外开放中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起到了重要试点作用,展现出强劲的示范引领效应。广东在全国率先出台首部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地方性法规,彰显了打造对外开放制度高地的信心和决心;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出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等,不断夯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根基。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与国际规则体系相衔接和融合,不断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法治化水平,才能确保在国际经贸规则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

推动实现市场相通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市场联通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

环节之一。新时代以来,广东按照党中央总体部署,全力探索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实现基础设施“硬联通”,推动商事登记“跨境通”、数据跨境双向流通等“软对接”。通过打破区域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有效提升湾区市场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出台《广东省高质量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行动计划》,设立12个省级(地方)RCEP企业服务中心等,推动广东成为RCEP区域重要的贸易枢纽,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实现市场相通,着力破除要素流动障碍,打通广东产品出海破圈的堵点卡点,使大湾区成为双循环战略枢纽,才能筑牢高水平对外开放动力基础。

坚持互利共赢开放 维护全球产业链畅通

互利共赢是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首要特征。只有坚持互利共赢,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才能有效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安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美国对中国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面临挑战。面对这种局势,广东举办展会链接全球资源,引入资金“活水”,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实施“广东总部+海外制造基地”的发展模式,实现“引进来”与“走出去”共融。同时,大力发挥创新这个关键变量在畅通双循环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推动构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生态。新时代广东对外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互利共赢、强化国际合作,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关系,才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从而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以数字化赋能美丽湾区高质量建设

湾区观察

□刘明伟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数字技术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动力源。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为建设国际一流美丽湾区注入强劲动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区域。

构建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能不断提升美丽湾区建设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有助于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动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国际一流美丽湾区注入强劲动能。

在美丽湾区建设中,要顺应数字化转型趋势,把握数字化发展机遇,拓展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驱动引领作用。在理念上,数字生态文明强调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来进行相关数据的汇聚、处理、分析和应用,做到事前预测预警而事后被动应对,同时也强调从整

体上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内容上,强调将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环节,包括生态环境治理数字化和现代化、数字化绿色化生产生活方式等。在行动上,强调社会多方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共同缔造。

以数字化赋能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以数字化赋能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构建智慧生态监测体系,推动生态环境监管执法智慧化。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环境污染的精准化防治是美丽湾区建设的重要要求。探索建立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大数据为驱动的生态环境监测监管系统,建立覆盖大湾区全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打造大湾区生态环境数据“一张图”,全面提升大湾区生态空间整体规划和系统管控水平。

推动产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一方面推动传统制造业、能源行业、交通运输业等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催生新兴生态产业。通过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发展,培育环境大数据服务、智能环保设备制造、生态修复技术研发、循环经济等新兴产业。推动绿色金融改革、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探索建立大湾区产品碳足迹与低碳产品认证制度,扩大碳排放交易与绿电交易规模。

建设智慧生态城市,提升公众参与度。推动智慧城市建设,优化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碳排放。推广绿色建筑和智能家居技术,打造低碳宜居的生态社区。利用数字技术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普及生态文明理念,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创新“数字+全员”参与反馈机制,促进公众参与决策、监督等过程,构建大湾区生态治理大监督格局。

完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法

规。支持粤港澳三地深化生态环境领域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探索试行与国际接轨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制定和完善数字生态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数据采集、使用和共享的规范,保障数据安全。

推动跨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通过数字技术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大湾区各城市在生态治理、环境监测、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与保护等方面的协同合作。高标准推进粤港澳生态环境科学中心建设。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和技

术。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数字化发展坚实基础。加大对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强数据中心建设,为生态环境数据的分析和应用提供支撑。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建设,完善数据综合业务网建设,增强数据利用可信、可控、可计量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美丽湾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数字生态文明作为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的生态环境治理方式,为美丽湾区建设提供了强大的赋能作用,能够突破区域时空限制,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模式从切块式、片段化向协同式、整体性转变。未来,应继续以数字生态文明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生态文明示范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注: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2024年度课题“新时代广州推进数字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研究”(2024GZGJ102)阶段性成果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镜,铸师德师风之魂

□许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深刻改变了党风政风,也为教育领域注入了清正之气。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其师德师风建设直接关乎人才培养质量与国家未来。当中央八项规定的务实精神与师德师风的崇高追求深度融合,一场以作风转变引领教育生态革新的实践,正在重塑高校教师的精神品格与职业操守。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师德师风建设的时代镜鉴

中央八项规定以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八项具体要求,划定了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其核心要义在于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回归务实为民的本色。这一精神内核与师德师风建设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教育者需以实际行动杜绝空谈,以清廉自律杜绝奢靡享乐。

在高校场景中,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践价值尤为凸显。例如,有高校曾因“学术会议变旅游”等问题被曝光,根源在于部分教师将学术活动异化为利益交换的载体。相反,也有高校将教师深入企业或乡村调研的实践及成果转化,纳入职称评审体系,使“纸上谈兵”的学术泡沫逐渐消解。这启示我们,师德师风建设不能停留于口号,而需以具体制度约束行为,以刚性执行倒逼作风转变。

正本清源:破除师德师风建设的现实困境

当前,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仍面临多重挑战。部分教师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名利轻育人”的倾向,甚至出

现学术不端、收受礼金等失范行为。这些问题暴露出师德师风建设的深层矛盾。一是形式主义之弊:部分高校将师德培训简化为“签到打卡”,将考核异化为“材料堆砌”,导致教师疲于应付并缺乏内心认同。二是利益诱惑之困: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输送、职称评审中的暗箱操作,使少数教师陷入“精致利己主义”的泥潭。三是监督缺位之痛:对师德失范行为的惩处往往停留在“通报批评”层面,缺乏震慑力,导致“破窗效应”蔓延。

破解这些困境,需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镜鉴,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师德治理体系。例如,高校可以建立师德档案,将教师课堂言行、学生评价、科研诚信等纳入动态监测,使师德考核从“软约束”变为“硬指标”。

知行合一:构建师德师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师德师风建设非一日之功,需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指引,从制度、文化、个体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制度筑基,以刚性约束划定行为红线。细化负面清单,参照《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制定涵盖学术造假、利益输送、教学敷衍等具体情形的师德失范行为清单,明确惩戒标准;完善监督机制,设立师德师风监督员,由学生、家长、同行共同参与评价;强化结果运用,将师德表现与职称晋升、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直接挂钩,对失范教师实行终身追责。

文化浸润,以价值引领厚植精神沃土。弘扬教育家精神,通过师德楷模巡讲、文化浸润,以价值引领厚植精神沃土。弘扬教育家精神,通过师德楷模巡

合攻关科研项目、共编教材等方式,提升团队学术能力,强化团队学术伦理;创新教育载体,开发师德师风VR体验课程,让教师在虚拟场景中直面利益诱惑、学术争议等情境,增强自律意识。

个体觉醒,以内生动力驱动自我革新。强化职业认同,通过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培训等方式,引导教师将职业从“谋生手段”升华为“价值追求”。提升专业能力,将课程设计、课堂管理、学生评价等纳入教师发展体系,使“站稳讲台”成为职业尊严的基石。践行知行合一,鼓励教师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在服务社会中深化对育人本质的理解。

久久为功:以作风转变推动教育生态革新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持久动力,推动教育生态从“表层治理”向“深层变革”跃升。破除“唯论文”痼疾,将课程思政效果、对学生的成长贡献等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促使“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改变;遏制“功利化”倾向,通过设立“基础研究特区”,适当延长考核评价周期,让教师潜心攻克“卡脖子”难题,彰显教育者的家国情怀;重塑“尊师重教”风尚,推出教师礼遇优待政策,在医疗、交通、文化场所为教师开辟绿色通道,让教师真正成为“受尊重的职业”。

教师是教育事业的核心力量,师德师风直接影响学生成长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当高校教师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镜,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为尺,必能在三尺讲台上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育人篇章。

(作者系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会主席、专职教师)